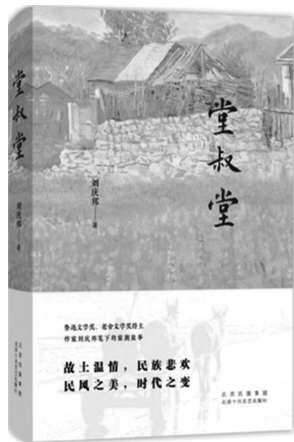


包浆陈厚的父辈历史

□王佳晨



2020年12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刘庆邦《堂叔堂》

刘庆邦的自身体验与中原乡土紧密相连，乡村一直是其写作的重要场域之一。纵观其多年的乡土创作，能够发现刘庆邦仿若一个勤勤恳恳的书记员一样，不会耍花样的把式，只是老实朴素地描摹乡村社会内容和日常民生。他坚守着写实主义的立场，剔除奇异的句子和写作的教条，仅以平实的笔触展现乡村世界和人性明暗。新作《堂叔堂》的书写亦是如此。刘庆邦称《堂叔堂》是他最为“贴着人物写”的一部小说，在这部长篇中，他将自己的家族生活经验完整嵌入到故事中，以十二个篇章叙述着自己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。小说里的堂叔们性格迥异，生活状态大相径庭，将他们作为例子去刻画个体生命的起伏跌宕和精神面貌，并在此基础上“发酵”出对人与历史关系问题的思考。

“我”和堂叔们生活的地方是刘楼村，这一村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刘姓群体组成，这也正是我能有一百多个堂叔的原因。从《堂叔堂》姓氏系统这一点上我们或许能窥视到中国乡土的家族文化面貌：整个村落是以父系血缘为中轴的，人们试图据此来达到相互体谅和辨认的目的：《情与理》中，我的母亲在生活各个方面待亲叔叔不薄，但对方屡屡为难母亲，我思考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母亲娘家在外地，叔叔就有些排斥；《到外面去睡》里晋姓的

小男孩想加入我们在大过道睡觉玩耍的队伍，我们以外来户的“罪名”痛骂他，排拒压制他。小说中所提及的周边其他村落也均是以姓氏作为村名，村落之间平时较少建立联系，只有在紧急时刻才会短暂建立村落共同体：在《又见大烟》这一章中，刘庆邦提及了战乱频繁时期，刘楼村曾付出财力、物力和人力与张庄寨一起修寨抗匪，也帮助陈庄攻击土匪，但也仅限于此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每个村落仍然基于礼俗社会，追求单一姓氏的集体认同感，关怀帮助自己宗族的成员，让血缘亲友体验到凝聚力和向心力，以此减轻生活的压力，并获得更多安全。

《堂叔堂》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基于血缘关系而尽显温情，反而用冷静客观的旁观者态度让读者看到，特殊年代里暗含的污浊如何让乡亲们无视血缘亲属关系，将人性引入无边的黑洞。《情与理》中我的亲叔叔在特殊时期，因为妒忌我家凭借政治任务“全家红”得以保障基本生活，和全村人一起向自己家人发起攻击，并不断以各种借口向我家敲诈钱财。结尾处我回家中得知，母亲无奈之下将辛苦喂猪得来的钱全数给了叔叔，我在院子里嚎啕大哭。刘庆邦在这里只留下一句：“谁能知道我为何哭得如此悲痛呢？”

特殊运动时期固然是《堂叔堂》里最沉重的一页，但刘庆邦也没有让民族的悲欢止步于此。沿着叔叔们的命运轨迹继续向前，仍然能看到他们身上所折射出历史的风云变幻。《叶落桃园》作为小说的开篇，通过大叔的人生经历展示着大陆与台湾的复杂变化。在国民党军队做军官的大叔远离刘楼村三十年，大叔的父母未敢提及过大儿子的存在。直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逐步回暖，1988年大叔辗转归乡，他所表现的光鲜阔绰引起了刘楼村民对台湾的美好向往。但当我于2003年前往台湾拜访大叔时，才知道他为了赚钱回大陆饱尝了怎样的艰难辛苦，大陆人在台的生活也并不是一幅洋溢着美好想象的画卷。时间前进到2008年，因为大陆的经济早已超过台湾，大叔带来的礼物已经不能再引起我们的羡慕。刘庆邦通过叙述大叔和

故土之间的聚合与撕裂，侧面阐释着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经济发展、时代政策和故乡认同感等多个命题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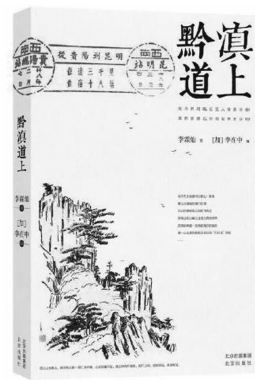
《不再喊他老师》这一篇则是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息息相关。我的堂叔刘本魁作为乡村老师，以新奇的教育方式受到全村人的欢迎和爱戴。他会吹笛子、写书法，也带领我们种甘蔗，用卖甘蔗的钱给每位同学缝制帽子，用十八般武艺为刘楼村构建了一个诗意的乡村之梦。然而，随着刘本魁从南京返乡，乡村之梦开始充斥着金钱利益的色彩。纵观刘庆邦的作品，不难发现他很少在小说文本中进行说教，他只是通过从细小切口抵达广阔时代的方式，引领读者去寻找被历史尘埃淹没的人影和风云。

人是历史的载体，历史反过也会塑造人。从个体生命里解读乡土历史，这是刘庆邦带给我们的新体验。他没有将《堂叔堂》构建为一本声势宏大的家族小说，而是将每一个个体当作试剂，放入滚滚的历史长河中，让读者去仔细观察体会两者之间的奇妙反应。在《大哭而去》中，刘庆邦描绘的一个细节，被梁晓声称为“文学创作史上从未有过的细节创作”：堂叔刘本沈为了换取工分，用黄泥冒充当人造粪上交至队伍里，被副队长发现并训斥罚分。这段看似荒诞且充满“黑色幽默”的情节，背后隐含着艰难尘世对个体的逼迫和哀民生之多艰的叹息。而这些细节是只有亲身体会过那个时代乡土生活的作家，才能书写得“真”。

《堂叔堂》所展现的父辈历史，犹如玉器古玩上的包浆一般，岁月表层上透着人物的经历自然氧化后覆盖的光泽，幽然且陈厚。整部作品因为基于刘庆邦的个人家族体验，几乎没有虚构感，仿佛纪实作品一般。而作家对于生活、历史细节的苛刻追求，加上衔接地气的语言文字，又使看似荒芜寡趣的中原大地，充满独特的生机和味道，拥有直指人心的力量。《堂叔堂》让我们看到了当技巧之心隐退后的写作意义：从泥泞的乡土经验里出发，使文学真正具有某种历史和社会学的认识价值。

山高水长，天雨流芳

□赵青新



2021年3月
北京出版社
李霖灿著
加李在中编
《黔滇道上》

“前半生玉龙观雪，后半生故宫读画”，这是李霖灿(1913-1999)对自己一生的概括。李霖灿的前半生是在玉龙雪山度过的，踏遍“纳西古王国”的山山水水，投身于纳西族文化，成为闻名遐迩的“摩些先生”；后半生在中国台北“故宫”博物院任职数十年，专注于艺术鉴赏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，长期推广中国美术史教育。

《黔滇道上》就是当年李霖灿与朋友这趟边疆艺术考察的成果，最初是1940年由《大公报》出版的，历经修订重版，现在的版本更加丰富。北京出版社目前推出的新版，包括以下几部分：①黔滇道上。记叙从贵阳出发徒步前往昆明的经过。②李霖灿日记。与①可对照阅读。③若干篇关于滇西北风土人情的游记。④中甸十记。民族艺术研究的专项调查。⑤附录。收后来的回忆文章，其中包括一篇李霖灿同学李溶关于南迁战乱的回忆随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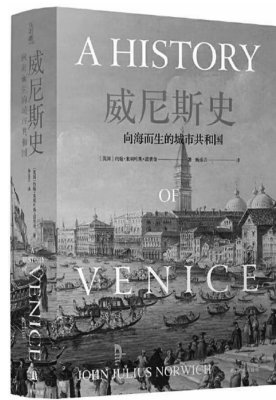
很显然，如此的布局与涵容，相互佐证，相互支撑，更加气象万千，读者更能融入其间。这部作品虽然初衷是田野考察，但是，它予人的观感，并不枯燥晦涩，具有一种小品文的韵味，细察其内容是叙述作者的见闻、作者的观感、作者的工作、作者的思想。用随意的文笔，自由的体例，说些他想讲的话，记些他认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。他所见的风景如丘壑陵谷、盘山公路，他所遭遇的社会境地如山民之困苦难堪，他所接触的人物如纳西妇女的装饰打扮，行文不见刻意，往往随口道来。有些是比较重要的事实，有些是无关宏旨的闲笔，书中又收有李霖灿许多的手绘速写，他的日记信札还配有邮戳，所以，阅读是很有兴味的。

李霖灿等人到达昆明之后，组织了“高原社”，每日歌声嘹亮，惊动了沈从文先生，不意结成忘年之交，这个小册子也为沈从文所激赏。沈先生代序写道：“虽本书所记载多注重在景物风俗，然兴趣广博，腰腿健劲，所见所闻，自然也就特别多。如对于黔省几十个大小洞穴，便有些极美丽惊险动人的描写。对于云南，作者愿心尤宏，且思就徐霞客足迹所未达各地方一一走去，因此更有许多摘星发现，如对于点苍、鸡足、玉龙诸山风景的叙述及中甸一带僧侣组织、社会风俗，都记载得特别引人入胜。”沈先生的梗概非常到位，抓住了全书的要点，李霖灿的冲淡笔调，在离乱中仍葆有平和的心境，想来也是吸引他的。

全书最大的价值，当然首推有关纳西族(摩些)的生活、艺术、宗教等方面的描述。摩些象形文字古拙殊异，掌握在东巴(巫师)手里，内含着纳西族特有的生死观念。这部著作是李霖灿研究纳西族的开端，在往后的余年，他长时间沉浸于玉龙雪山，即使离开了彼时彼地，始终记挂着那片土地，他在很多场合，在自己的中国美术史课程上谈论它们。李在中说，云南丽江四方街木府前的石碑坊上写了四个大字“天雨流芳”，意为天降雨露，滋生万物，若以纳西语发音，则意为“看书去”。这四个字，让我恍惚觉得了，艺术与人生的缘分。

掀开面纱的威尼斯

□林颐



2021年6月
译林出版社
[英]约翰·朱利叶斯·诺里奇《威尼斯史》

轻盈纤细的贡多拉、抑扬婉转的小调、莎士比亚的戏剧、高雅的艺术和建筑、作家们的散文游记……说起威尼斯，我们想起的，可能就是这些。但是，隐藏在迷人书写背后的威尼斯，或者说，使它脱颖而出，一度称霸地中海，最终走向衰亡的原因，到底是什么呢？

英国历史学家约翰·朱利叶斯·诺里奇认为，最关键的部分仍然是缺失的。诺里奇撰写了这部厚重的《威尼斯史》，以“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”高度概括威尼斯的本质特征，从公元421年威尼斯城市的诞生，一直讲到1797年共和国在拿破仑的铁蹄下覆灭。

向海而生，意味着外向型的基本生存策略，资源太少，只能向外求索。逃避战乱的流亡者们决定在这片潟湖上定居，威尼斯经历了迭次的动荡、人口扩张和内部争

斗，作为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附属国，在几个强国的夹缝中辗转周旋，努力积累筹码，保持实质的独立。公元697年，威尼斯人以居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总督。总督的权力后来被架空，到了17世纪，由25岁以上的权贵组成大理事会，自动连任，负责选举和任命其他官员，如参议员、“十人委员会”成员等，负责处理城邦日常事务。

12世纪初，威尼斯军械库建立。威尼斯抓住了大发战争横财的好机会。军械库的生产极其高效，组织体系很有条理，威尼斯的商船可以投入战斗，战船则准备了充足的空间来装载货物。这种设计思路表现了威尼斯人高度的实用主义，威尼斯能够快速组织起集体且规模较大的力量，实现财富的流动与转化。威尼斯人尊重法律和契约，我们从莎翁戏剧里就能领悟到。威尼斯人擅长“变脸”的戏法，哪怕你是热那亚人，我最大的对手，我也可以放下仇恨，跟你合作，携手拓展贸易版图，转过头，双方又是你死我活。

毋庸置疑，逐利是本能，经济利益是首要目标。威尼斯人重视有效配置资源与建立联盟。从12世纪开始，威尼斯的商贸活动发生了质的改变，香料、丝绸、手工艺品、奴隶买卖等繁荣昌盛，成为城邦经济的支柱。威尼斯具有世界城市的多元化气质，犹太人在威尼斯商界大展宏图，比在欧洲其他城市生活得更自在，但是，威尼斯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犹太人，侵吞他们的财产，逼迫他们佩戴特殊标志。在臭名昭著的第四次“十字军东征”中，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点，威尼斯人的作为断送了这项伟业。

历史学家威廉·麦克尼尔写过有一部

著作，叫《威尼斯：欧洲的枢纽1081—1797》。麦克尼尔从全球史的角度分析了威尼斯在这个时期扮演的关键角色。麦克尼尔强调威尼斯的媒介作用与领导者地位，而诺里奇突出思维意识及其对行动的指导，强调了威尼斯非凡的经济恢复力，以及威尼斯人的族群性格与国家对这种性格的宣扬和强化。

寡头制民主政体的根源，建基于威尼斯人的价值观念。它接近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理想政体，被寄予一切政体形式和谐统一的期望。既是民主制的，因其大议会；又是贵族制的，因其参议院；还是君主制的，因其总督的存在。平衡与稳定是商业必需的环境要求，也是这座城邦共和国至高无上的理念——先做威尼斯人，再做基督徒。这是一座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城市，但它又渴望在动乱与纷争中牟利，野心与贪念不时滋生。晚期威尼斯的衰落，与新航路的开辟、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有关，同时也因为威尼斯的公民意识消耗殆尽，因为商业侵蚀所导致的追求纯净且统一的基督教信仰的活力消散了。

诺里奇勋爵曾任“拯救威尼斯”基金会主席、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主席、国家名胜古迹信托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，还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、皇家地理学会和文物研究学会成员，他有能力写出百科全书式的、包罗万象的威尼斯史。但是，他放弃了对美第奇、贡扎加等家族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事迹的具体描述，也抵制了建筑、雕塑、绘画、文学等领域对他的诱惑，诺里奇所做的尝试，是为了掀开这层若有若无的面纱，有如聚光灯式地、清晰地把它暴露出来，让人们看到历史的深处。